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六期 ——  
(二〇一四年一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401b)

【细说历史】	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	杜钧福
【史海钩沉】	林彪事件后的空军 3 4 师	佚名
【往事实录】	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戚本禹
【追根溯源】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余汝信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细说历史】

### 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

• 杜钧福 •

—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舆论界掀起一股道歉风暴，围观者纷纷叫好。我也认为，应该欢迎他的道歉，应该相信他的道歉是真诚的，因为他是在文革中干过坏事的干部子女中第一个道歉者。

陈小鲁应不应该道歉？按照他的同学计三猛的意见，他根本用不着道歉，因为他在文革中一向反对暴力，也没参加红卫兵，所以媒体“炒作”他的道歉是错误的（见计三猛博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陈小鲁的道歉岂不是虚伪的吗？所以计三猛这些人是在帮陈小鲁的倒忙。

陈小鲁道歉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利用“红二代”的特权，将反思文革带到公众面前和议事日程上来，因为谈论文革尚属于禁忌。蒯大富等人也道过歉，但是哪家报纸肯登他的文章？也没有舆论“炒作”。舆论“炒作”陈小鲁是看得起他，不要得便宜卖乖。

陈小鲁道歉的意义还在于，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法治。“‘文革’的根本错误在于

违宪，对‘文革’进行反思，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法治教育。”“所以我觉得对‘文革’进行反思，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对法治的教育，对有关宪法的教育，对公民权利这方面的教育。剩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经济体制改革也好，这些都是防止‘文革’再现，但是实际上‘文革’已经不可能再现了，……。”“既然我们搞宪法，那搞宪法行政是天经地义。”（《对话陈小鲁：“文革”不可能再现》，《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他这里提到忌讳字眼“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放在“剩下”的里面，也是难为可贵的。

我支持陈小鲁的道歉。他的道歉在他反思文革的道路上走出了可贵的一步。我希望每一个参加过文革的人都能以认真的态度进行反思，要真诚地面对历史。

但是我仍希望陈小鲁能再进一步，因为他的道歉还有不完备之处。

陈小鲁的道歉主要针对在他任革委会主任期间在他的学校里的暴力行为。这一道歉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因为尽管他本人没有对受害者施暴，尽管他可能制止过某些暴力行为，但对于他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的悲惨事件他必须承担责任。这是常识。

但是，1966年8月以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在北京市全市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血腥的暴力事件。我不认为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完全比作纳粹是恰当的，但是就其性质和惨烈程度而言，可与所谓“红八月”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比较的，确实只有德国柏林的“水晶之夜”。

在这一事件中，陈小鲁有没有责任？这里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西纠”。问题的焦点在于西纠究竟是制止武斗的组织还是进行武斗的组织？

陈小鲁说，“我们的理念和红卫兵是有差别的”，他所在的八中的党支部书记被虐待致死后，“对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觉得应该制止暴力，于是“把红卫兵当中高年级的、比较优秀的、有理智的、讲政策的人组织起来，成立西城纠察队，授权他们去管住不讲政策的行为。”（同上）

这当然很好。按照现在通行说法，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因为这天西纠成立宣言发表。但是我们考察“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近郊区死难人数的逐日分布时（数据来源于王友琴），我们就发现，在西纠成立后，罹难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猛增，由2位数变成3位数了。而且，北京市在此期间总共死难1772人也集中在西纠成立后的这个时期。

那么这些暴力行为或许发生在西城区以外的别的区里吧？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城区和近郊区中，就属西城区死人多，为333人。

再者，在后来的9月份成立的红卫兵东城纠察队（即东纠）的成立宣言上有一句话“在我区纠察队成立之前，西城区纠察队代职了近十天。”（宣讲家，文革十年文献库）这话或许说的是在西纠成立后的前十天，即在整个杀人高潮中，西纠不仅横行西城区还染指东城区。

整个杀人高潮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西纠的活动时期高度一致。而且，无论西纠领袖陈小鲁，还是其他文革参加者或研究者，迄今还没有举出一个实例，说明红卫兵正在实施暴力时，有西纠成员前来制止。所有的记载和回忆都是西纠在实施暴力。

能说他们“制止武斗”的唯一事例到地质部对付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保护何长工。实际上，何长工根本不需要保卫。地质学院《东方红》到地质部要求原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学校检查，一千多人到地质部机关静坐，属于和平的斗争方式，老干部未受到威胁，工作队长后来回

学校检查，也未听说受到虐待。而是西纠制造了武斗事件，还抓走了《东方红》8个人。这能算是保护老干部吗？

8月19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也就是西纠骨干力量，联合北京新团市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前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和原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负责人、三个学校的校长等人。三个学校人员和其他学校代表共千余人出席大会。“黑帮分子”二十多人被迫跪在主席台上。大会进行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武斗升级，批判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殴打。所有被打者都头破血流、不成人样。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这些被虐待者，也应该算是老干部了。

西谚云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让我们仔细揣摩一下细节。我们说，西纠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是指其发表成立宣言的日期。很多迹象表明，它实际成立在这之前。8月24日，大规模死亡就已发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不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一些材料披露，在8月22日早上，西城区31个中学红卫兵在师大女附中开会，决定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紫竹：《红八月》，天涯社区，2006）。

恰恰在这个早上，发现八中党支部书记死在她被拘禁的房间里。

所以华锦之死和西纠成立未必是因果关系。陈小鲁在这里说的未必真实。

西纠的行为和陈小鲁的叙述很不一致，是陈小鲁在胡说吗？

## 二

因为文革真相被深深隐藏，我们必须在历史的碎片中仔细整理爬梳。有迹象表明，陈小鲁或许不完全是胡说。

这里的关键是，西纠有前后两期，或者说，有两个西纠。陈小鲁说的是前一个，而在“红八月”里施暴的是第二个。在陈小鲁心中的是前一个，而大众所见到的是第二个。

电子刊物《记忆》第97期胡庄子先生的文章《“西纠”九问》（也见胡庄子的博客）提出了文革史研究中很重要而至今仍模糊不清的西纠问题，而且贡献了一些新的材料，例如说西纠实际上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8月4日就有国务院办公厅给予“北京市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5千元经费的文件。这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虽然实际成立日期仍待考证，但至少使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不必把其正式成立日期当作时间上限。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西纠有前后两期之分，否则无法解释许多现象。在前期，西纠确实如陈小鲁所说，是红卫兵内一部分人的组织，初衷是司对内纠察之职，

有人说，见过西纠的成员证件，不是所有西城红卫兵都是西纠。四中西纠成员刘辉宣的回忆录《只是当时已惘然》中所说的也如此。他说：“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其中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显然，西纠成员和“普通红卫兵”有明显不同。

如果西纠是8月25日才成立的，这些话很难理解，与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不上。看了胡庄

子先生的文章，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关键之处是西纠成立时间。按照胡先生文章引用的材料，西纠实质上的成立时间应在8月4日以前，较其正式成立提前20多天。按照刘辉宣的说法，有个“先是……，最后……，不久……”的发展过程，不是几天的功夫。查北京市在8月24日，即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被无辜打死的人数已达几十人，想其中不乏西城区居民。所以，刘辉宣的说法印证了西纠成立时间远早于8月25日，离打死人事件还远得很。

我们可以设想，在这20多天里，西纠有个发展过程。最初它是少数学校的红卫兵建议成立的。这少数学校可能就是四、六、八中。成立之初，只有部分学校或这些学校的部分红卫兵是纠察队员。而成立的初衷，确实有对红卫兵进行“纠察”的意愿。这也符合“纠察队”一词的本来意义。在成立初期，也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到了后来，就正如刘辉宣所说，参与了抄家打人，和其他红卫兵没什么区别。在此期间在八中发生了华锦被迫害死亡事件，还有八中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得引起败血症，经抢救得以保命。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折磨后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校外人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对于这些惨剧，西纠扮演了什么角色？

8月25日正式成立的西纠更不能算纠察队。在西纠成立宣言上署名的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以后又有19所中学的红卫兵或其它名称的类似组织参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就是这50所中学的红卫兵是集体加入西纠的，也就是说，这些红卫兵组织是西纠的集体成员，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西纠的成员。胡先生文章中有一句“《嚎歌》是‘西纠’所属四中红卫兵创作的”，似乎也是这样认识的。

我手头无详细资料，但我在西城区生活过。我知道，这50所中学基本包括了西城区绝大多数中学。所以，当时西城区的所有中学红卫兵基本上都是西纠成员。但这种认识和纠察队这个名词的意义不符。都是纠察队，谁纠察谁呢？

所以这个后期的西纠不是纠察队，是西城区全体红卫兵组织的总称。这也符合北京市民的记忆，凡是“红八月”在西城区发生的恶行，都归之于西纠。

公众不知道前期西纠，只见后期西纠在为非作歹。而陈小鲁、刘辉宣说的都是前期西纠，而对后期西纠避而不谈，鸡同鸭讲，对不上茬。

公众不关心前期西纠，关心后期西纠，因为在这个时期里，确确实实有1772具被打得不成模样的尸首送到火葬场。而在这时期横行乡里的只有西纠。而打死人这种现象，被陈小鲁称为“不讲政策”。他说“‘红卫兵暴力’是开始反思红卫兵运动后才出来的词，我们当时把打人、吵架称为‘不讲政策的行为’。”

陈小鲁说得很是。但是现在他不是提倡法制、法治吗？那么为什么现在还使用红卫兵的语言呢？他现在还把六中的西纠开设监狱，实行“红色恐怖”，草菅人命都称为“不讲政策”。他真的想和红卫兵思维决裂吗？

当时确实没有“红卫兵暴力”这样的词，但是“草菅人命”的词已存在几百年了，陈小鲁为什么不用呢？

这样的“不讲政策”，说出来一件，就令人发指。

8月23日，属于西纠的31中和女八中红卫兵到西长安街文昌胡同6号北京建筑材料工

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孙菊生家，借口他家住的是自己房产进行抄家。20多个红卫兵从此驻扎在他们家中，每天轮流用皮带和钢鞭殴打他们。8月27日，孙菊生的姐姐孙启坤因逃避她的驻地铁道学院红卫兵的迫害，来到孙菊生家。铁道学院红卫兵通知驻在孙菊生家的中学红卫兵，她来了就抓起来。结果，孙启坤在孙家遭毒打被打死。两天之后，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又将孙启坤的姐姐孙玉坤打死。

8月28日，家住西城区大红罗厂20号的玻璃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一家五口被38中红卫兵打死。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被保姆抱出得以活命。

也有红二代老红卫兵承认打死人的事，例如说“‘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影响。”（李卫雨、张爱民、纪彭《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虽然用的仍是当年的语言，否定的只是“不良影响”，但比陈小鲁强。

在“红八月”里，除去市区近郊区的暴力外，在昌平区大兴县等郊区县内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西纠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但不能说与此无关。

《炎黄春秋》2012年2月份上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披露，在昌平县公安局的会议上，宣读和印发了西纠的“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对杀人狂潮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

### 三

陈小鲁为什么不愿涉及后期西纠以及它所干的一系列缺德事呢？

拿他的好朋友计三猛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媒体热炒陈毅之子道歉文革，好像他娘的文革是咱们发动的！好像咱们在认罪文革！高姿态不等于替伟大领袖担罪！你的道歉信很诚恳，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绝不替伟大领袖开罪！谁种下的仇恨谁就应该自己遭殃！”

陈小鲁也是这个立场，只道自己的歉，绝对不牵涉别人。我猜测，在他看来，前期西纠是他自己的西纠，后期西纠，尽管自己是领导人，却不是自己的西纠，是被强加的，所以不对它负责。

看来高姿态，实际有难言之隐。问题可能还不仅在于伟大领袖。

“红八月”北京市区近郊区打死1772人，绝对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所能策划所能完全负责的。

打死人也许不是策划者的初衷。打人源于抄家。不少红卫兵回忆都说抄家是到派出所去领的任务，按照他们提供的名单抄家的。也就是说，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至于这名单是彭真时代准备的，还是文革前夕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准备的，我们还不知道。有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写了《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一书，但对这些事讳莫如深。

为什么抄家呢？当时打的旗号是搜查隐藏的枪支弹药。致使上述黄瑞五一家五口毙命的原因是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一枚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子弹壳。宣武门内医生蒲伯扬一家三口同时被害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曾任职北平市警察局，红卫兵怀疑他们家藏有枪支。（蒲以勉《北京东西城》）

只有追索枪支，而被抄家者又确实没有枪支，在严刑拷打下才会把人打死。当然这也许是个借口，在这个借口下，人性的恶尽情发泄。

陈小鲁说这是不讲政策。按照法治的语言，是没有政策这个词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法治，就是不讲政策。但在传统语境，政策是有其本来意义的。警察审问犯人，打了他一些，可以算作不讲政策。但是像黄瑞五这样的技术员、蒲伯扬这样的医生，他们根本不是原来所说的地富反坏右，根本不是阶级敌人。

派出所的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的。这为一些领导人在“红八月”以后的公开讲话内容所证实。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提过“黑户”这个词。如叶剑英在9月25日说“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这回“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所以他的“黑户”概念就是独门独户。他的话证实文革“红八月”在北京抄了一万多户，驱逐了8万多人，就是针对这样一批中产阶级的精心策划的暴力行动。他们自己知道这是违法也违反政策的，所以借助于红卫兵，让他们担当责任。这也是计三猛的愤怒所在。

“谁种下的仇恨谁就应该自己遭殃”。计三猛说得很对。但是，陈小鲁们对北京市社会上的惨剧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 四

我支持陈小鲁的道歉，但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参加过文革的人都应该反思。这个反思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是和传统决裂的过程。陈小鲁在反思时，还难免使用原来的语言。

陈小鲁反复强调他是反暴力的。我相信他的表述，也许他的内心确实是不赞成暴力的。但是在他的文革生涯中，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在文革的“红八月”中，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面临的灾难面前，她把两根上吊绳作为孝顺女儿的礼物送给她最亲爱的双亲。

你相信世界有这样惨痛的事情吗？如果你处在这种境地，你会有其他选择吗？红卫兵爷爷明天就会降临，你能忍心看你的双亲被严刑拷打，被开水活活浇死吗？把他们平安送至另一世界乃是女儿的最大孝心。

我说这些是想表示，在这个“红八月”里，在北京市民面临的空前灾难里，你，陈小鲁，作为横行京城的西纠领袖，强调你反对暴力没什么意义。你对普通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仍采取漠视的态度。

陈小鲁说，他反对血统论，“血统论造成了老红卫兵的分裂”。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分裂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老红卫兵有过政治分歧，但是没有组织上的分裂。

这样的分歧有三次。第一次是在8月13日的红卫兵斗争“小流氓”全市大会前，一派力主结合批判工作组和团中央，而另一派认为应集中批判“小流氓”，表明他们的批判重点分别属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这是初期老红卫兵运动的两个方面。最后这个会议以斗争小流氓为主。

这象征着中学的红卫兵运动今后主要关注社会问题，正如印红标所说：“红卫兵运动一旦初具规模即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追求‘红五类’的标准而忽视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第二次就是在“红八月”，分歧发生在西城区的红卫兵和海淀区的红卫兵之间。我们注意到，在此期间，以清华附中为代表的海淀区红卫兵两次发表声明反暴力。

相对而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代表的海淀区红卫兵更富理想主义色彩。尽管他们也打人，但并非一味打人。清华附中红卫兵是血统论红卫兵中的理论家。从理论上，其领导和智囊也知道打人不对。他们发表反对打人的宣言有两次。前一次是如穆欣所说，在斗争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穆欣说是7月，但实际是8月13日）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北航附中联名印发了一份《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呼吁制止乱打人，维护党的政策。第二次是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布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心内容是反暴力。

尽管陈小鲁说他反暴力，但我们没有看到西城区的红卫兵有这样的表现。最能说明西纠政治主张的是8月26日的行动，当日他们挥舞皮鞭，涌到《人民日报》社，气势汹汹地勒令该报停刊，原因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署名海淀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的《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信中说要造爸爸妈妈养尊处优的反。八二六事件是红卫兵内部两种思想冲突的表现。

西城区四中的刘辉宣说，他们很看不上海淀区那些红卫兵，他们群龙无首，没“组织意识”。在另一处他说，海淀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光辉普照，而西城区红卫兵后面有周恩来的身影。

第三次政治分歧是1966年12月联动成立时候的事。当时部分老红卫兵决定成立联动，并在12月6日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准备对初期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进行检查，对社会表示要“继续革命”。中央文革也准备参加。结果在会上，部分参加者不满大会的基调，实行“冲会”，并放爆竹捣乱，结果江青到了门口见此情景未进返回。从此中央文革和联动生分了（李卫雨、张爱民、纪彭《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所以这次分歧是要不要在“不讲政策”层次作检讨和根本不承认任何错误之争，但是也没造成分裂。

虽然反思还基本上停留在“不讲政策”的层面，陈小鲁从违宪角度总结文革，自然有它的意义。但是在中国，违宪是制度性的，不全怪个人。也没什么法律处理违宪问题。相反，在1982年的“严打”中，有人抢了一车西瓜者竟被判处十年徒刑。光讲“违宪”，有点大而无当、推卸责任之嫌。况且违宪也有不同的层次。剥夺人的生命，特别是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事件不是一般的违宪。所以我觉得也应该从违法角度总结。当然当时没有刑法，但也不是能随便杀人的，况且命案没有追诉期。纳粹罪犯不是过了六七十年还在追逃吗？“红八月”期间，在八中发生多宗命案。陈小鲁要讲法治，应该从这里开始。

当然，要追究犯法，就要弄清事实。要实现正义，也要弄清事实。上面我所说的西纠故事，是我从我了解的历史一鳞半爪知识中总结的。真相如何，陈小鲁最清楚。我希望他说出关于西纠的真相。

再者，要从人类文明角度总结，因为西纠的暴行不仅违法，而且违背公认的人伦道德，冲破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实际上是反人类的罪行。有人说，在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上，组织者强迫被批判者的家属坐在台下观看他们的长辈被虐。是谁想出这样的卑劣主意的？

也可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角度总结。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进行和完成的，并象征性地明确表示为国旗上的四颗星。但是如上所述，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暴行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在西纠的第三号

通令中也明确提出要查抄包括资本家的“黑六类”。陈小鲁则建议并实施解散各个民主党派。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昔日盟友的背叛，是当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 五

最近看到陈小鲁又发表文章说“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这话说得很好。说明真相可能比道歉更为重要。只有说明事实，才能厘清责任。只有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道歉才有意义。

我希望作为重要当事人的陈小鲁先生能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下列问题的真相：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在陈小鲁人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八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其中党支部书记华锦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谁对她施暴，谁为她的死负责？

八中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得引起败血症死里逃生。谁对她施暴？

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折磨后自杀身亡。谁应该为此负责？

到底有几名校外人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对于这一惨剧，陈小鲁为什么不道歉？

谁筹备了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谁安排被斗干部的亲属观看他们的亲人受到残酷折磨？

西纠何时成立？如果按陈小鲁所说是8月25日成立的，那么8月4日国务院批给西纠5千元经费是怎么回事？

8月20几口，西纠“正式”成立大会何时何地召开，什么人出席？

华锦死亡和策划成立西纠何者在前？

什么人布置你们到各个派出所领取任务到“黑户”去抄家？

陈小鲁是否参与首次提出“黑六类”概念作为清理对象的西纠通令？这个概念出笼的经过如何？

陈小鲁是否参与了驱逐“黑六类”出北京的西纠通令？你们是如何策划这一罪行的？

陈小鲁是怎样提出解散各个民主党派的？

陈小鲁是否参与起草和批发西纠“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

在这期间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1772名受害者，其中西城区333名，是被谁残酷杀害的？西纠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陈小鲁，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但你必须对历史作出交代。

□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

~~~~~

### 【史海钩沉】

#### 林彪事件后的空军34师

• 佚名 •

〔编者按：从本文内容看，作者似乎是空军34师102团地勤机械师，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南苑机场。〕

九一三事件重创了年青的人民空军。由于林立果的存在，空军司令部成了反革命大本营。全国空军各级干部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一大批空军军师级干部被监控和隔离。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执掌下的空军34师。由于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部署谋杀毛主席”的西郊机场秘密



据点的存在；由于林彪乘坐34师100团的三叉戟外逃；由于101团直升机出逃未果，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34师百倍警惕。从9月13日深夜，34师三个机场已经被天罗地网紧紧覆盖。

9月13日0时32分，林彪256号专机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就空军司令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毛泽东南巡返京时命李德生调入北京南口的38军一个师，此时派上了用场。兵飞三路，直插34师的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拂晓之前，34师三个机场的跑道都已部署了六个炮兵阵地，每一架飞机前都挖好了一个机枪掩体，无数支黑亮的轻重机关，对准了每架飞机的机头。

34师的三个警卫连被解除武装。34师的营房四周被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陆军士兵严密封锁……

9月13日凌晨5时许，一阵急促的电铃将我们从梦中惊醒。“紧急集合”，102团全体官兵在一、三大队中间的操场迅速地列成方队；团参谋长在一名陆军军官的陪同下，向全团宣布了以下命令：一、从今天起，所有飞机禁止升空；二、任何人不准跨入机场；三、全体人员禁止外出；四、离开宿舍楼必须三人以上结队，任何人不得在营区私自走动；五、禁止使用电话、电报、通信等方式和外界联络；……

34师的官兵一下了被禁闭在自己的宿舍楼里，连吃饭从宿舍到饭堂的路上都在陆军弟兄们的监控之中。所有的人都感觉的到了异常；所有的人都知道34师出了大事了；但出了什么事，当时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包括我们34师那么多的高干子弟，也由于被禁止通信联络而迷茫的不知所以……

不能进机场，飞机不能修，也不能飞，所有的官兵一起床就学习，读《毛选》、学《马列》，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到中央在10月份公布林彪事件的一个多月里，34师的官兵就是在这种近似俘虏营的日子中渡过的。

按照空军的规则，飞机是要定期进行检修、保养、运转的。“不怕动，就怕停”。任何型号的飞机最长在一周之内要启动发动机运行一下。否则，发动机上润滑系统就会干涸、操作的关节部位就会生锈，甚至于抱死，一个多月时间，飞机纹丝不动，对34师几百架飞机是要命的事。34师的师级干部全部被隔离，从陆军来了一个政委、一个副政委主持34师的工作，对飞行一窍不通的他们，只懂得清查林彪死党，如何会知道，再这样停下去，34师的飞机就有全部报废的危险！

出于对国家财产的责任心，34师各团机务处、师工程部向空军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李德生将军打报告要求对所有飞机进行机械日维护。李德生不敢做主，请示周总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才允许34师机务人员进入机场，对飞机进行检修。

这一次进机场，真叫我开了眼界，南苑那里还像个机场，简直是陆军的阵地，到处是陆军的军车，机场美丽的草坪被挖了无数个散兵坑机枪掩体，像一座座坟包从地面鼓起。所有的枪口，正对着我们的飞机。原先在机场负责警卫的机场警卫连战士一个也不见了，手持冲锋枪，自动步枪的陆军士兵密密匝匝地机场游走。可怜的一排排飞机，活像被看押的一个个俘虏……

按照惯例，我们地勤兵解下了蒙布，插上了地面电瓶，用轮挡将飞机挡好，搬动螺旋桨，准备试车。就在这时，对面的掩体中一下子冲出来十几个陆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向我们扑了过来，一个个用刺刀逼着我们，喝到：“不许动，再动我们就开枪了”。

“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我们问这些愣头青似的陆军士兵。“这个飞机，你们开起来跑了怎么办”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我们赶忙解释：“跑不了，你看，每个轮子前都有轮挡挡着呢。”这个军官低头看了看轮挡说：“这么小个东西能挡住这么大的飞机？笑话，骗鬼去吧！”我一下子无名火顶到了脑门，走上前去，拍着他的肩膀问道：“老弟，你说，怎么样你才放心。”他说：“捆起来绑紧就跑不了”。当时，真叫人气的肚痛。无奈，只好听这们蛮不讲理的陆军军官的指挥，找来一捆麻绳，将飞机绳捆索绑了一番。

这十几个陆军士兵左看、右看仍然放心不下，将我们维修飞机使用的方梯，一个个摆在飞机的前面，才让我们试车。随着发动机的起动，一帮士兵端着枪，掩体里的机枪瞄准驾驶仓，直到试车完毕，这帮陆军兄弟们才将紧绷的神经松开，放下了武器……

随后的日子里，全师各飞行团的空地勤人员，被集中在西郊机场，听林彪死党们的坦白录音和审讯过程录音。此时，我们才知道九一三事件的真相。

从陆军调来的政委和副政委开始组织揭发34师胡萍的死党。胡萍从34师建师以来一直担任这个师的师长，所有的师、团干部都是他从普通的飞行员一个一个地提拔起来的，几乎没有一个没受过胡萍的恩惠。于是，胡萍死党越抓越多，师级干部一个不拉地进行了亚疗的“学习班”，团级干部一个个地进了“招待所”。102团团团长周连珊人缘极好，口才极佳，飞行技术也特棒。是最后一个被免职的团长。他的罪状之一，就是批准驾机带林立果飞到香港上空视察地形。审完了师团级干部，又开始鼓动官兵揭发大队一级的胡萍死党。其实，这些人又何尝知道林彪的政变阴谋。持续不断地揭批运动，将34师干部搞的人人自危，工作全部瘫痪……

九一三事件使空军34师经历了一场浩劫，干部队伍换血似地进行了调整，师团两级被认为烂透了，甚至飞行大队一级，都调来了陆军的政委，大批被认为与林彪及其死党有牵连的飞行员被停飞；一批专机被下放到各大军区；部分空勤机组被整建制地转到民航。34师虽然依然是中央专机师，但飞行任务骤减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当然与信任度的降低有关……

九一三事件一场浩劫大大地伤了34师的元气，这支赫赫有名的中央专机师，从此一蹶不振……。从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像空军34师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将帅子女。上至元帅，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下至军师长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在这支部队。仅仅在我的视野之内，34师就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刘伯承元帅的孙子，彭绍辉上将的儿子，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杨勇上将的儿子，许世友上将的女儿。军师长一级、中将、少将、大校级军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

34师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一是由于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待遇最高的军种；二是由于34师是运输机师，事故率、死亡率相对较小；三是由于34师是中央专机师，可以有机会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四是由于34师的驻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会。34师的高干子女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群体，给34师原本特殊的政治地位增添了极其浓重的一笔。这个特别的群体对34师特有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些对中央高层内幕知道很多的高干子弟，政治嗅觉特别敏锐；敢想一般人不敢想的大事，敢说一般人不敢说的狂话。他们由于父辈的原因，特别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我的入团介绍人王志键，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的父亲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一个经过长征的将军。在他的身上，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

1970年，新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的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做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的讲用报告。这个报告，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吹捧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林立果被吹捧为“天才、超天才”。这个报告抛出不久，我参加了在空军司令部礼堂召开的“庆祝《空军报》创刊X周年”的大会。空军报副总编辑，林彪女儿林豆豆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吴法宪在会上又一次吹捧林立果是“天才、超天才”，号召全空军向林立果学习。开完会回到部队，闲聊中我和王志键谈起会议的情况。当他听到林立果被吴法宪吹捧为“天才、超天才”时，他不屑地冷哼一声说：“狗屁！他是超天才？那他父亲是什么？瞎吹，吴胖子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在当时那个年代，这话传出去，立马就抓你的现行反革命。可他、就敢怎么想，就敢这么说……第二次议论朝政，是江青借军队干部走后门一事向叶剑英元帅发难。叶剑英的小儿子被34师发配到东北农场劳动改造。王志键和几个高干子弟安慰叶帅的儿子回来，怒气未消，狠狠地对我说：“江青这女人太狂了，早晚非倒霉不可。”当时的我，对江青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坏，对志键的狂妄之词，也只是听在耳里，烂在心里……

王志键对国事的关心，很让他吃了不少的苦。首先，在批林批孔，揭发林彪死党的运动中，他就倒了一次大霉：从陆军来的师团干部，让高干子弟们揭发林彪的死党和军内干部和林彪之间的交往。王志键出于对党的责任心，将他知道的军内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私交，一五一十的作了汇报。其中涉及到他父亲的老上级，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到34师任职的陆军干部，有几个第三野战军的老人。这些与许世友有过命交情的军人，马上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在102团任飞行中队长的许世友的女儿许华山。许华山一听，她一直当好朋友的王志键竟敢把父亲和林彪扯在一起，当时就气得柳眉倒竖，狠狠地给了王志键两个耳光……。这一次错误，给王志键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师部指示，搜集王志键的错误言行，组织批判。于是，大队政委在大会上点着他的名字说：“我敢说，你王志键的日记里一定有反动言论，你敢不敢拿出来示众？”王志键气的青筋暴涨，就是不敢把日记拿出来。我看过他的日记，那是万万不可示人的，如果在今天亮出来，他是英雄；当时亮出来，他就必死无疑。他把对社会，对大人物的不满都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亮出来，那还了得？1976年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王志键在天安门广场搜集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被便衣警察跟踪、拍照。实打实地被抓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整整关押了半年之久……。关心国事、政治的王志键，被国事、政治玩弄了整整一生。复员转业到上海市委的他，还是得罪了权贵，被地方监狱又囚禁了一把。一直到脑溢血夺取他年仅50的生命，他对党，对祖国的一腔赤诚，丝毫也没有改变。王志键是我一生见过的最具男子汉风范的人，他敢想、敢干、敢作、敢当、豪爽、敏锐、赤诚、热情、执着。但他生不逢时，满怀无尽的报复，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志键坎坷的人生，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感慨！多少美玉，沉沦在污泥浊水之中？多少人杰，在尘世中如落叶一般一文不值？人尽其才的社会，是多么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难怪人类社会，会有那么多屈死的忠良，冤死的义士，沦落的才子……

高干子弟有他们极优秀的一面；也有被工农子弟鄙视的一面。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前面提到的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子，就是因为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而惹恼了他所在的102团2大队的行政副大队长。他在全大队的会上，将叶帅的儿子点了起来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今后再这个样子，该去那去那，不要回来了。”飞行大队的干部战士，当然支持这个副大队长的正义行为，他们联名给叶帅写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飞行员”。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剑英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讯？”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找人。

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中国的女飞行员，是体现中国妇女地位的职业，第一、第二批女飞行员都是从极优秀的高中学生中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而1973年分配到34师的第四期女飞行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军师以上将军的女儿。那一时期，女飞行员的职业，几乎成了高干女儿的专利。

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迫承元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上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风气……在这批高干子弟的队伍中，还有一批原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子弟。这些人在高干子弟的队伍中很受歧视，思想很压抑，尚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子弟活的自在。我们中队就有一名叫纪海的战友，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海军的起义将领，少将军衔，当时任北海舰队某潜艇学院的院长。纪海聪明、坦诚、好学。在他们一批兵中是佼佼者，但始终得不到重用。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如今，当年曾在空军34师服役的高干子弟，有不少已经佩上了将军的肩章；有不少已经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也有一些去戎从商，成为商战中的骁将；有些已成了异国的国民。但他们一定会和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战友一样，会不时地记起，当年在空军34师度过的峥嵘岁月……

□ 摘自舒云新浪博客

## 【往事实录】

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 戚本禹 •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我们，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12日）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次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杭州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可能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去告诉主席我们到了。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主席在散步，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可主席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的。但，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2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5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

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噢，它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嵯峨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嵯峨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嵯峨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这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嵯峨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嵯峨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

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那天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的记忆力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一定要亲笔写，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

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总理和我们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的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还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对李秀成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当时，我很感动，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为全党习称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并且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因此，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由《红旗》杂志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重要社论，是要经过中央讨论的，比较慢；而在《人民日报》发社论，一般只要总编看一下就行了，比较快。后来这篇文章就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



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之期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继续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的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把我国分裂为几大块，以吃掉我们的不祥之兆。

（海青、国志整理）

附：毛主席“五七指示”全文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大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编者按：本刊编辑在2013年12月23日收到友人发来的戚本禹先生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文章，友人说：“戚是坚定的拥毛派，他的观点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也算独特的一家之言。如有学者愿意，他的文章出来后可再作评论。未知《华夏文摘》有意发表、以利在网上传播否？”本刊编辑认为戚本禹先生叙述的毛泽东关于《五七指示》发布的前后经过很有史料价值，以前未曾有人披露，其观点可以争鸣，但不宜因其观点而废其言。〕

~~~~~

【追根溯源】

“五七指示”：毛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其破产

• 余汝信 •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1）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后按写信日期简称“五七指示”，多为人所知。所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本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工作简报（2），毛泽东借题发挥，洋洋洒洒一大通，将其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含义。

文件原规定仅发至县、团级党委，不登党刊。196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建议：将中央转发的《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像一九五九年主席的六条指示信（党内通信）一样，印发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基层支部中去，直接向广大党员和群众宣读，并认真组织讨论。文件由支部委员会负责保存，经常检查执行情况，每年向群众宣读和组织大讨论一次或两次”。（3）

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社论同时用黑体字公开了经过文字修饰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社论称：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

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就可以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大大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我们，就会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办事的，现在还在不断发展提高。解放军是最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全国的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商店、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以解放军为榜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4〕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逆社会发展潮流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滥觞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

毛泽东早于1919年便服膺于“新村生活”的构想。所谓新村主义，原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提倡，武者小路实笃心目中的“新村”，人人平等，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各取所需。1918年底，武者小路实笃甚至还在日本九州岛宫崎县内购地40多亩，建立起“新村支部”，信众始为19人，后发展至22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三号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详细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引起了颇大反响。一时《新青年》、《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都对新村主义进行了介绍。与此同时，工读互助主义也在中国悄然兴起，一部分青年远渡重洋出国勤工俭学，一部分则将其与当时流行的互助论、新村主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与新村主义相类似，其特征为：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一边读书，一边工作。〔5〕

1919年12月，毛泽东将其草拟的新村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毛的新村，是从创造新学校始，“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学校中的新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6〕

青年毛泽东要将其乌托邦式的新村计划试验于“湘城附近”，无论有无去试验或试验成功与否，均无伤大雅。问题是四十年之后，毛泽东已是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的“伟大领袖”，一旦要将全国都作为实现他那些花样翻新的乌托邦式理想的试验场，破坏力不可谓不惊人。

新的乌托邦，叫人民公社。

1958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引述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这句话后面，陈伯达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

生活，文化教育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试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7）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内称：“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质量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产主义时代。”（8）

北戴河会议甚至断言：“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翌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际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9月10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9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它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9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9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武修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9）

1958年11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报道了该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内称：“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头脑极度发热，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10）

同年11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草稿），主要内容为：（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它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应当实行的一种比较适当的分配方式。（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七）要把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当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月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实质上对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的做法是赞同的。

同年12月7日、10日，毛泽东为印发陈寿《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两次写了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

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研究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11）

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毛泽东将他的批语与《张鲁传》一并印发予党内高干，缘由是他认为，他所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张鲁政权在许多做法上十分相似，“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甚至他心目中理想的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劳动武结合”，也类似张鲁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故而，“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不仅要求普遍推广人民公社，而且还要求推广军事化的民兵师组织。1958年9月，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称：“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12）军事化与人民公社化伴随而生，1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研究一下”的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中也说：“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13）

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利用行政性权力，超越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赋予强烈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和军事共产主义形式的畸型混合体。到了1959年，人民公社的名称虽还保留（且一直存在到文革后的1984年），但实质内涵已有极大变化，供给制、公共食堂、免费吃饭等等已不能再实行，所谓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狂妄计划，只不过给历史留下了一个笑柄。接下来的1960年代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头过日子。始料未及的是，1964—66年初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日子刚刚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头脑中左的一套又故态复萌，“五七指示”，就是承继和发展了人民公社运动极左的空想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思维的典型。

“五七指示”所描绘的，是毛泽东头脑中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模式。王禄林在《〈五七指示〉初探》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一模式有如下的特征：

（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按毛泽东的理想，其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农、学、兵，从而可以成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这样发展下去，不仅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界限将逐步消失，而且“小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界限也逐步消失。

（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王禄林认为“五七指示”中要建立的“大学校”，与人民

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王禄林还认为，经过1960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毛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从“五七指示”发表一直到毛逝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过。

（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毛泽东所追求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大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文化，这似乎就达到了每个人在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没有经过“大学校”的，所谓由旧学校培养的学生，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识分子、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等等。王禄林认为，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14）

我们倒认为，毛泽东要构建的，决不是一个什么理想国，而是一个与世界发展潮流、与普世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怪胎。在“五七指示”中，毛强调军队“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农民、学生统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深恶痛嫉，不言而喻。然而，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十年，资本主义显得比毛式“社会主义”有活力得多！“五七指示”中军事共产主义的色彩，更甚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其中体现出来的毛的“理想社会”模式，更接近于试图将整个中国社会工、农、学、商各行各业全面纳入一个划一思想、划一意志的军事化大兵营（美其名曰“大学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其实不就是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距离很近吗？！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写这样一封信给林彪，中央文件的标题也突出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毛的本意，值得推敲。是否有借用林彪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谋求在地方上也树立林的威望，以换取林彪的支持，以求在军队及全国顺利遂行毛的个人主张之意？

在毛写了这封信之后，林彪内心是否支持毛的主张？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毛泽东这类军事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倒是并非军人出身的张春桥曾在1958年就阐述过并得到毛的赞赏。张春桥当时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即称：“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张春桥还称：“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15）张春桥将战争年代军队中的供给制美化，并要将其延伸至和平年代的全社会，其思想之“左”，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春桥与毛泽东思想的接近和“理解”，是否就是毛泽东晚年“换马”，要抛弃林彪这位毛认为已是尾大不掉的“换班人”而换上张春桥的主要原因呢？

就在毛泽东津津乐道他那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将原始共产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作为最高目标，不以社会效率为价值取向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想国”的当月，中国实际上已揭开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国家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十年，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物质极度匮乏，武斗连续不断，整个中国大地满目疮痍。

相反，同一时期的西方各国，却是另一番气象。一度被认为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其经济正经历一次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在3%以上，西德达到6%，日本则达到9.3%，个别年份甚至超过15%。战前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科技成果被大量转移至民用，一大批崭新的行业被建立起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后西方各国大力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使经济增长得以保持强劲势头；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都着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情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6）

以毛泽东的所谓“理想模式”改造中国，事实证明，此路不通！在整个1960—70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西方各主要国家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个中缘由，难道还不值得国人反思么？（2013年11月）

注释：

〔1〕中发〔66〕271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15日。

〔2〕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报告内容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围湖造田，就违反了自然规律，人为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军队搞生产，组建了大量非作战部队，既加剧了军队的膨胀臃肿，又为文革之后发展为军队大规模经商创造了条件，危害巨大。

〔3〕中发〔66〕389号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印发“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通知》，1966年7月31日。

〔4〕《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1966年8月1日。

〔5〕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页122—123。

〔6〕胡长水、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页124。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318。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360。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02—403。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94—497。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627—629。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430。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页523。

〔14〕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载《回首文革》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172。

〔15〕《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6〕参见龚学平主编：《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 原载《记忆》总第105期，2013年12月31日

本期编辑：

胡海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